

收藏：石鸥

编著：石鸥 吴小鸥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

1897—1949

湖南教育出版社

收藏：石鸥

编著：石鸥 吴小鸥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

1897—1949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 1897—1949/石鸥编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355-5967-8

I. 百… II. 石… III. 教材-编写-史料-中国-1897—
1949 IV. G42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011282 号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

1897—1949

收藏: 石 鸥

编著: 石 鸥

吴小鸥

策划编辑: 杨新援

责任编辑: 杨新援 刘 芳

责任校对: 龚 宇 曾朝晖 李 平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i.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27 QQ 2284117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89×1194 12 开 印张: 36 字数: 720 000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55-5967-8

G·5962 定价: 198.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序

记得刚恢复高考,我在填写志愿时,竟然那么义无反顾地填报了国内两所名牌大学的考古系。命运却安排我进了教育系,从此开始了我在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这块天地里的闯荡。在这块天地里,我曾经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阅读、思考和写作伴随着我的教学实践,当然也伴随着我的成长历程。然而,无论如何,我总能从那些揭秘并重新诠释历史的作品中获得激动与新奇。于是,也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我竟然痴迷于旧教科书的收藏,而且这种兴趣日渐浓厚,从自我观赏翻阅,慢慢到为它们的一些人物、一些机构、一些理念、一些文字、一些图画而陶醉。当教科书收藏多起来时,把它们按不同的历史阶段、学科、出版机构和作者变换着排列起来,依照教育的、心理的、文献的、历史的甚至出版的视野,细细看去,竟也看到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我慢慢地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大清帝国的日落——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痕迹;当然也看到了中华民族一天天走出愚昧,中国教育一天天走向现代的矍眊日出。

教科书进程大致与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相仿佛。它不仅是对变革的百年中国的记录和目击,而且它本身就是百年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凭借教科书我们重返 19 世纪末,并一步步走来,就好像到发展演变中的学堂中走了一圈一样,经历了一场从旧式私塾与书院到新式学堂的大转变。教科书不仅复活了古老的文化,而且回响着时代的声音。它浓缩了整个中华文明史,寄托着中华民族一直苦苦追求的全部梦想。

我们在这里不是书写百年教科书史,我们是想让百年教科书述说自己的历史。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大量教科书实物照片,这些照片的呈现纵向上沿时间的线索,横向上考虑教科书出版机构。百年时光,百年教育,百年课本,翻天覆地的变革虽已过去,遗存的教科书却述说着不可磨灭的意义。一课一课的重复或变化,铭刻了多少天翻地覆的沧桑。凝重的印记,传递着遥远而清晰的信息。它们像贝壳,散落在大海之滩。我们力图把它们串起来,尽管这是异常艰难的事。

这里展示的教科书以我个人的藏书为限,不强调理论的深究,偏重版本、出版社、学科的史

料价值。当然,按时间先后排序仍然是大思路,在这一思路下,遵循教育本身的发展路径。这其中难免有个人的趣味和偏好。我有意多选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的教科书,这是必然之事,因为这几家出版社在中国早期教育发展特别是教科书出版中确实作出了重要贡献,值得大书特书。有些书品相较差,特别是根据地的教科书,也还是依原貌呈现出来了,以体现其历史的沧桑感。

我的博士生、湘南学院吴小鸥教授在照片和文字整理上与我一样经历了无数个日夜的煎熬。大量的疑难问题,我们在网上讨论,察看所拍摄的照片或教科书实物,然后热锅蚂蚁似的到处寻解,我每提出一个问题,她就会惊呼这是难啃的钉子户。一本书、一个人、一个术语、一个机构……就可能耗去她一整天或数天,甚至翻来覆去好几个月的时光,有些到出书时还是没有标准解,还是教科书之谜。惹得我常与吴博士说:“教科书研究简直就是考古!”——是呀,考古,终于回到了我三十年前填报的志愿领域了。巧合?还是冥冥中天意安排?还有研究生石玉,简直成了我的项目助理,大凡教科书收到了,该付款、该登记、该照相的事,都是她去安排去完成的。当然,本书的面世还得感谢我项目组的诸多朋友、同事、学生,方成智教授、赵长林教授、王昌善教授、刘丽群博士、李祖祥博士、覃兵博士、段发明博士、邵汉清博士、李水平博士、赵志明博士等,还有一批硕士。多好的团队!多少次咖啡香弥漫着我们教科书研究的沙龙,多少次不得不把沙龙延续到半夜时分,咖啡香一晚晚清醒着我们的头脑,教科书却把我们的头脑一次又一次地搅昏。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见到了阶段性成果。

本书对于教育教学工作者及广大收藏者来讲都是一本珍贵的参考书。能将百年教科书集中起来作为一个专题出版,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湖南教育出版社《书屋》杂志聂乐和主编给了我连续十二期封面插画和文字介绍的厚待,《湖南教育(语文版)》黄耀红先生宽容地连续十二期刊发我们撰写的语文教科书的文章,他们的眼力让我由衷钦佩。

石鸥

2009年1月



清末民国教科书发展概述

一般认为教科书是传播知识、普及道理的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用书,是学校教学中重要的和基本的教学材料。教科书在学校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它是国家意志、民族精神和学科发展水平的体现,是实现培养目标的基本手段,是教学、考试的重要依据。

中国的教育,几乎是与教科书“携手并进”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和《千字文》,以及更高层次的《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曾经是长时期里教育的重要教科书,离开它们,几乎就无法谈教育。在教科书身上,刻着教育发展的印记,折射着历史的痕迹。

但中国古时候没有近代意义的学制,没有普通学校,只有启蒙教育和准备参加

科举考试的私塾和书院,不论是《三字经》《百家姓》,还是“四书五经”,都不是现代学校所称的教科书,也没有教科书一说,甚至从严格意义来讲,它们不是真正的教科书(仅仅是教材而已,教科书属于教材,但它不等于教材)。我们认为,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应该满足如下条件:第一,产生了现代学制,根据学制,依学年学期而编写出版;第二,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教授法、教学法)或教学参考书,教授书内容要包括分课教学建议,每课有教学时间建议等;第三,依据教学计划规定,按学科分门别类地编写和出版。依此标准,以前不论是《三字经》《百家姓》,还是“四书五经”,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科书。因为它们的内容上是笼统而不分科的(基本上把语文的、政治的、历史的、地理的等都包含其



中),在程度上是模糊而不分级的(很难说《三字经》《百家姓》以及“四书五经”究竟在几年级学习是恰当的),在分量上是主观而不分课时的(究竟一个内容学习多少时间,几乎完全凭教书先生自己的判断),在学习方法上是完全随意的(没有教授书可以参考,重点难点都由教师自己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科书。现代意义的教科书名称始于19世纪70年代。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大会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曾先后编辑算学、泰西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教科书,除供教会学校应用外,也赠送各地传教区私塾应用。“教科书”一词也因此流传开来。而严格意义的教科书在我国的产生,应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时新学制出现了,新学堂迅猛发展,适应新学制新学堂的教科书也就大量涌现。

我们认为,依上述三条标准,商务印书馆1903年出版的《最新教科书》可以称得上我国自己编写的严格意义上的教科书。它依学年学期而编写,它依学科而编写,它有与此配套的教授书(今天的教师用书),对如何教学课文有建议。所以这套教科书在我国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现代意义教科书的产生经历了一个

过程,由现代意义教科书的产生到系统化制度化又经历了很长时间。应该说,一百多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教育改革的发展,从最初套用国家经典,到开始考虑教学实际需要的材料;从翻译外国教科书,到国人自编教科书;从以封建伦常、道德乃至性命之学为主要内容的教科书,到注重儿童日常生活、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科学和救国爱国等方面取材的教科书;从文言文教科书到白话文教科书;从初始没有标点符号和插图的不够完善的教科书,到有标点符号、有精美插图、适于教学的教科书;从单学科、局部的教科书,到自成体系、完备的教科书等等,我国教科书编写与出版走出了一条值得大书特书、认真反思之路,这也是我国教科书逐步制度化和科学化之路,更是我国学校教育迅速发展和逐步走向现代化之路。

一、西方教科书的引进时期(19世纪50年代—19世纪末)

1. 教会学校对教科书的引进

19世纪中期,教会学校在我国发展比较快。据初步统计,1842至1877年全国基督教办的学校有350所,学生5975人。^①为了教学的需要,当时比较著名的教会出版机构出版了一些教材,也就是广义的教科书。如墨海书馆(1843年创办)出版的《光论》(1853)、《重学浅说》

(1858)、《谈天》(1859)、《数学启蒙》(1853)、《续〈几何原本〉》(1856)、《代数学》(1859)、《代微积拾级》(1859)、《地理全志》(1853—1854)、《全体新论》(1851)、《博物新编》(1855)等;美华书馆(1860年创办)出版的《形学备旨》(1885)、《代数备旨》(1891)、《八线备旨》(1893)、《代形合参》(1893)、《英字指南》(1879)、《法字入门》(1887)、《格物质学》(1898)、《地理略说》(1883)、《万国药方》(1886)等;广学会(1887年创办)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1894)、《中东战纪本末》(1896)、《自西徂东》(1888)、《七国新学备要》(1887)、《文学兴国策》(1896)等。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也称益智书会)从1877年开始编初级和高级的两套教材。包括数学、天文、测量、地质、化学、动植物、历史、地理、语文、音乐等科目。据1890年傅兰雅报告该会历年来的成就,14年中自行编辑出版的审定合乎学校使用之书48种、115册。^②1902年,清政府颁行新的学制,各地学校纷纷采用新式教科书,有相当一部分,尤其是自然科学课程,仍直接采用益智书会所编的教科书。在益智书会所编的教科书中,最具规模和最有影响之一的当属傅兰雅编写的《格致须知》和《格致图说》两套丛书。

2. 洋务派及维新派对教科书的引进

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晚期少数

① 陈景馨.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58.

② 王树槐.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事业[J].载林治平.近代中国与基督教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1:199.

新派人士办洋务、兴“西学”。洋务学堂为了应付西学课程的急需,在并没有经过严格的甄别和正规的编制的情况下,临时仓促翻译了一些西方教科书。当时有组织的翻译机构主要是京师同文馆翻译处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据载,“在短短的几年内,同文馆师生共编译书籍 20 余种,而且还在馆内设立了专门的印刷机构,以聚珍版刊行于世”^①。据《增订东西学书录》和《筹办夷务始末》统计,译书有 35 种,计有法律 7 种、天文学 2 种、物理数学类 6 种、化学 3 种、语言学 5 种、医学 2 种、历史学

2 种、经济学 2 种、游记等 6 种。^②这些书籍可以说是一些“西学”的入门书。同时,同文馆的许多译书也被该馆和其他新式学堂采用为教科书,如《万国公法》(1863)、《法国律例》(1880)、《公法会通》(1880)、《格物入门》(1868)、《物理测算》(1868)、《英文举隅》(1879)、《星轺指掌》(1876)、《全体通考》(1886)、《富国策》(1880)等。^③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 19 世纪中国官方最大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据《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至宣统元年(1909),计译出 160 余种,1075 卷。^④这些译

书,很多都被洋务学堂和新学堂以及新式书院作为教科书使用,而且其中一些还由清政府免费分发给全国的官员,如《考试司机》(1895)、《兵船汽机》(1894)、《汽机发轫》(1871)、《金石识别》(1872)、《地学浅释》(1873)、《测候丛谈》(1876)、《代数术》(1872)、《微积溯源》(1874)、《决疑数学》(1880)等。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为救国图强,维新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维新派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这一时期引入的教科书除自然科学外,社会科学日益增多起来,包括了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经济、政治、社会学等学科,但主要以政治和法学类为主。1898 年,广智书局发行日文翻译教科书多种,有《速成师范讲义丛书》《支那史》《中等教育伦理学》等。据统计,京师大学堂从 1898 年到 1911 年翻译、出版了西方教科书约 60 余部 100 多册,其中属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占 62%。^⑤



① 陈东.我国近代出版事业特色初探[J].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文集[N].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131.

② 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M].台北: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158~161.

③ 毕乃德.同文馆考[J].中华教育界,1935(2).

④ 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M].1909石印本.

⑤ 程恩富.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J].求是,2004(11).



二、民间自编教科书的兴起与现代教科书的成型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

1. 学堂教科书之兴起

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倡实学的浪潮逐渐高涨,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大量涌现。缺乏合适的教科书已成为新式学堂教学的巨大障碍,于是一些有创新思想的中国学人率先开始了自编教科书的尝试。其中1897年南洋公学(1896年创办)“由师范生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编撰《蒙学课本》,共三编,是为我国人自编教科书之始”^①。嗣后,又有朱树人、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合编的《物算教科书》《笔算教科书》《本国地理教科书》等印刷发刊,各地新式小学堂广泛采用这些教科书。不

久,上海三等公学堂(1896创办)也编成《字义教科书》(又称《蒙养镜》)。上海澄衷学堂(1899年创办,又名澄衷蒙学堂)教员刘树屏自编《字课图说》四卷,把识字教科书提到了比较高的地位,识字教学的科学性加强了。无锡三等公学堂(1898年创办)前后历经三载,于1901年完成《蒙学读本全书》七编,并于1902年请官厅存案出版,载明“寻常小学堂读书科生徒用教科书”,并附有文法书,类似于教学法,以供教师教学时参考。同年夏季,俞复、廉泉等创办文明书局于上海,又将《蒙学读本全书》重印发行。至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907—1908)间,已印10余版。这几套教科书可谓我国自编最有影响的小学教科书。

2. 现代教科书的成型和坊编教科书之发展

1898年,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办)率先出版了谢洪赉编写的《华英初阶》和《华英进阶》,影响很大。这两本书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新式教科书拉开了序幕。此后,随着“新政”的开始,商务印书馆顺应了自编教科书的潮流,将清末的自编教科书推进到了崭新的高度。到1902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华英文教科书29种,英文教科书11种,汉文教科书19种。^②1903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最新教科书》一套,独步神州,发行“不及两周,便销出5000余册,未及数月,行销10余万册”^③。这套教科书依学级学年学期而编写,依学科而编写,有与之配套的教授书(今天的教师用书),有课时的分配,对如何教学课文有建议。所以这套教科书在我国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应该说是我国第一套严格的、现代意义的教科书。

到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初等小学教科书就有40种,其中学生用30种,教员用10种,科目涵盖了修身、国文(还有简明国文、女子国文)、文学初阶、国语、珠算、笔算、历史、地理、格致、习字帖、习画帖、毛笔习画帖、画学、唱歌(还有女子新唱歌、唱歌游戏)、舞蹈游戏、体操、方字等。1906年又另编了《简明教科书》。这套教科书从此基本取代了各种蒙学读物。



①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插页[M].中华书局,1957:138~139.

② 商务印书馆.矿物学[M].1904:封底.

③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11.

与此同时,1902年创办的文明书局因其创办之初便出版了无锡三等公学堂的教科书《蒙学读本全书》,一炮打响,声威大震,并且有效地占领了教科书市场。紧接着文明书局又推出了一套蒙学丛书,到1904年,文明书局共出版蒙学教科书25种,其中有经训修身、文法、中国历史、西洋历史、东洋历史、中国地理、简明中国地图、外国地理、简明世界地图、心算、笔算、珠算、天文、地文、地质、植物、动物、格致、化学、生理、卫生、体操、毛笔、铅笔习字帖等。由于所编教科书经过实地试验,确有所得,切合于蒙童应用,于是各科教科书都冠以“蒙学”二字,总称为《蒙学科学全书》。^①

此外,从1902年开始,普通学报社出版一套普通教科书。1905年,上海会文学社出版有《最新初等小学教科书》数种,其中高等小学堂教科书10种、初等小学堂教科书23种、中等及师范学堂教科书9种。^②同年,杭州彪蒙书室率先用白话文印行了各种初级蒙学用书,如《绘图蒙学识字实在易》《中国地理实在易》等。这些在我国教科书发展历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说明我国许多现代出版机构一开始是从教科书出版发家的,教科书出版也为我国现代出版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① 丁福保.蒙学卫生教科书[M].1905:封底.

② 何琪.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初等小学第2册)[M].会文学社,1910:封底.

③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511.

④ 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113.

⑤ 《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暂用书目》,光绪三十二年.

三、教科书的审定与制度化时期 (20世纪初—1926)

在汹涌而来的教育改革潮流的冲击下,清政府为了有效管理教科书,开始建立教科书审定制度。1904年颁布了《奏定中学堂章程》,并明确规定:“凡各科课程,须用官设编译局编纂,经学务大臣奏定之本。其有自编课本者,须呈经学务大臣审定,始准通用。官设编译局未经出书之前,准由教员按照上列科目,择程度相当而语无流弊之书暂时应用,出书之后即行停止。”^③1905年底,清学部成立。1906年清政府已有国家设立的教科书编纂审查机构(编译图书局),并且颁布了《教科书审定办法》。至于审查的项目,除了教科书的内容外,还包括价格、纸质、挂图、教授法等。从1906年起,清学部陆续审定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初级师范以及女子教育方面的教科书。有人统计,据清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的暂用书目,当时经审定而颁布的教科书共102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54种,文明书局出版的有30种,直隶学务处出版的有10种,南洋公学出版的有4种。^④(其实,据我们实际统计,文明书局出版的应为33种,直隶学务处出版的应为11种。)^⑤

1.清末统编教科书之初始

清政府颁布新学制之后,十分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不仅在中央组织了编写教科书的专门机构,而且在各省也设立了官书局。在中央,清政府先后成立了大学堂编书处和编译图书局,作为出版统编教科书的官方机构,但大学堂编书处存在时间不到两年,所以清末的官办教科书主要来自编译图书局。编译图书局成立于1906年6月,是清学部设立的编撰和审定学堂教科书的专门机构。1907年春季,中国第一册全国统一的教科书《初小国文教科书》应运而生,开创了统编或官定教科书之先河。至1909年,初等小学各科教科书已全部颁行。1910年,高等小学教科书全部颁行。另外,学部编译图书局针对年长失学之愚民及贫寒子弟为对象,又出版了一套《简易识字课本》和一套《国民必读课本》,影响较大,还有《算术课本》和《简易珠算教科书》等书。

2.民初课程标准教科书之兴盛

民初是指1912年至1927年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民国经历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开始从传统旧教育走向现代教育。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在南京临时政府建立时期,教育部首先发布了《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



《普通教育暂行课程之标准》，规定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同年，教育部颁布新的教育宗旨，否定清王朝颁布的封建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两个核心条目，认为在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1912年9月，中华民国政府颁布《审定教科书图书规程》，实施教科书审定制。中华民国建立后教育的大变革，也必然导致教科书的大发展。这一时期，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以及1917年成立的世界书局等机构编辑出版了大量教科书。

中华书局(1912年创办)一成立就编写出版了初小、高小、中学三套全新的《中华教科书》，并配合出版了相应的教授法图书。由于适合新学制需要，并赶上春季开学，为各学校广泛采用，几乎独占了1912年春季开学的全部教科书市场。接着，商务印书馆于1912年6月按新学制出版了初小、高小、中学三套《共和国新教科

书》，并出版《民国新教科书》13种。同时，为了既适应新学制秋季始业的规定，又照顾老学校一时难以放弃旧学制春季始业的做法，商务印书馆将修身、国文、算术、图画、唱歌、体操六种教科书都分编为春季用和秋季用两种。还出版了《教育部审定初等小学补习科用书》一套。1912年9月，教育部公布各级学校修业年限调整的新学制，中华书局于1912年12月出版初小、高小各一套《新制中华教科书》，并于1914年出版《新制中学教本》。中华书局为了

照顾当时许多学校一时难以改变清末学制春季始业的习

惯做法而于1913年出版了《新编中华教科书》。当时单级小学呈增长趋势，中华书局又于1914年出版了一套《单级中华教科书》，分修身、国文、算术三科。由于女子教育的提倡，中华书局还于1914年编辑出版了《中华女子教科书》及《中华缝纫教科书》。1915年商务印书馆根据教育部新颁的《特定教育纲要》，出版一套从小学到中学的《实用教科书》，内容以趋重实用为宗旨。同时该馆还根据当时不同的学制和办学形式，先后出版《简易课本》《半日学校课本》《单级教科书》《复式学校教科书》等，以方便教学。

这一时期，中国图书公司、上海科学会编译部也出版编辑了一些新的教科书。特别是上海科学会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中学教科书，如《实用主义中学新算术》《温特渥斯立体几何学》等。据资料统计，在1912年到1916年间，教科书发行，商务占五六成，中华只占四成，其他小书馆合占一成。

3.新文化运动白话教科书之发展

北洋军阀政府的专制统治和复古主



义文化教育措施,促使一批受过资产阶级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觉醒,他们在文化教育领域里发动了一场旨在改变人们思想观念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20年1月1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明令改“国文”为“国语”,并通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的“国文”改为语体文(即白话文),同年4月,又通令全国各地,从1922年以后,凡国民小学各种教科书一律改为白话文,文言文教科书逐渐被淘汰了。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尤其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小学教学法发生了演变,许多学者认为教学应摒弃教授主义,而采用直观主义、自习主义、实用主义三大原则。为了顺应这股潮流,教科书出版界也开始了新动作。1915年12月中华书局出版了高小、初小、国民学校用《新式教科书》。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英语模范读本》,1919年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一套系统的小学白话



语文教科书《新体教科书》。1920年,伴随着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国民学校一、二年级改用语体文,不久又颁布新式标点符号的命令,1921年5月商务印书馆的《新法国语教科书》出版,除教科书、教授法外,特编自习参考书,供师生应用,开编辑上之新纪录。1921年1月中华书局开始发行《新教育教科书》,国民学校用者,全用语体文编写,高小用者,语体、文言互用,国语读本有注音字母,至1922年出齐。同时,中华书局亦出版《新教育教科书国语读本》,改用白话文编辑,生字全部注音。

4. 新学制教科书之成型

1919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开始讨论修改学制系统。1921年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制定了一个新学制系统草案。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1922年11月1日公布实施新学制,史称“壬戌学制”,又称“新学制”。

1923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发行《新学制教科书》,中华书局于1923年出版《新学制适用新小学教科书》及《新中学教科书》,从1924年起,商务印书馆还出版《新撰教科书》,用文言文编成,以适应边远地区和上海部分学校仍用文

言教学的需要。同时又出版《现代初中教科书》一套。世界书局于1917年创办,很快就开始出版小学教科书。在竞争中,世界书局不断革新教科书内容和版式,其中,《世界儿童国语》《世界儿童算术》《图画课本》等,均受到大中城市初等教育界的欢迎。

四、多种教科书体系并存时期 (1927—1949)

从1927年开始到1949年,当时在国内形成三种主要的教育体制,相应地形成三种不同的教科书体系。

1. 国统区教科书

国统区课程标准教科书 1927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推行“一个党,一个主义”的专制教育。1927年12月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16条。1928年5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决定取消“党化教育”一词,以“三民主义教育”代之,并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说明书》。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三民主义教育宗旨,《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通令颁行。1929年11月公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等,审查标准核定为“符合党义、党纲及其精神,并适应教育目的、学业程度及教科书体裁,符合国情,适合新时代”^①,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教科书的中心思想”。同时,建立了严格

①曾天山. 教材发展的比较研究[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7).





的教科书审查制度。

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新时代教科书》。同年,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新中华教科书》。世界书局于1928年编辑出版《新主义教科书》。这都是比较系统的、有较大影响的教科书。

1931年8月,遵照教育部决定,修订了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课程标准,通令试验推行。商务印书馆根据新的要求,编辑了一套《基本教科书》13种,没有来得及出版的书稿,于1932年毁于“一·二八”战火。在战火中成为废墟的商务,在激愤中喊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编印《复兴教科书》,至1933年8月,整套小学、初中用的《复兴教科书》及教学法已经出齐。以“复兴”冠于书名之前,其

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1932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发了《小学课程标准》,分别就小学初、高两级的课程目标、内容等作了规定,并要求将“党义”课教材融化于国语、自然、社会等科目中,另设有“公民训练”课以实施训育。于是,1933年,中华书局出版《新课程标准课本》一套,世界书局出版《新标准世界教科书》一套,大东书局出版《新生活教科书》一套。1934

年儿童书局出版《儿童教科书》一套。同时,为提高教学效果,儿童书局于1934年出版陈鹤琴等主编的《分部互用儿童国语教科书》,按地区分北部、中部、南部三套各8册。1936年,中华书局根据教育部“修订小学课程标准”,编辑出版《修正课程标准新编课本》初、高小读本各一套。

开明书店(1926年创办)1929年出版《开明英文读本》共3册,此书一面世,各地中学竞相争购。1932年出版《开明国文课本》,课文全由叶圣陶亲自编写,由丰子恺书写并绘插图。这套教科书全部是创作或再创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图画与文字有机配合,以拓展儿童的想象,涵养儿童的美感,这在当时同类教科书中是很新颖的

做法。教科书初版后先后印行40余版次,深受师生的欢迎。1934年出版《开明读本》,1935年出版《国文百八课》(原计划出6册,后因抗战爆发而实出4册)。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叶圣陶先生在中学语文课本的编制上更加明确地倾向于文言、语体各成体系。1946年出版的初中用书《开明新编国文读本》(甲种—语体,乙种—文言),以及1948年出版的高中用书《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和《开明文言文读本》,就是他们试行文、白分别编制的具有代表性的两种。1947年,开明书店将叶圣陶编纂的高小《开明国语课本》改编为《少年国语读本》(4册)重新出版,先后连续印了3次。1948年8月,又将高小《开明国语课本》改编为《儿童国语读本》(4册)重新出版。之后又将初小《开明国语课本》改编为《幼童国语读本》(4册)重新出版。

此外,1933年,教育部组织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编印教科书,并成立“正中书局”编印公民、童军、军训、国文等科的教科书,指定为各校必须采用的课本。1934年正中书局出版中学教科书一套。另北新书局、新国民图书社、民智书局等也出版了一些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大多依照教育部颁行的各科课程标准编辑,其中国语教科书以弘扬民族精神为中心,注重救国雪耻的教育,并以发明故事、科学故事、读书方法指导掺杂其间。1932—1935年间,一些出版单位还专门编辑出版华侨课本,如



新国民图书社出版了供华侨初小学生读的《南洋华侨国语读本》8册,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分别出版了供华侨高小学生读的《南洋华侨国语读本》《南洋国语教科书》各4册,教材内容着重介绍祖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人民勤劳智慧,以激发侨胞子女的爱国之心。

战时国定教科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7年8月,国民政府认为,“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遂决定以“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工作总方针,颁布了“一切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的《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为了保证战时教育方针的实施,还制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明确规定了发展战时教育的具体政策。1940年3月,国民政府从增强抗战力量和建国基础,促进地方自治计,公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推行儿童义务教育与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合一的新的国民教育制度,将小学改为国民学校及中心国民学校,以普及国民教育。

面,由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文通组建成“七联”在重庆共同印行。上海各书局教科书的出版业务暂告停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定本教科书移至上海印行,原有教科书进行了增订,在“七联”基础上增加儿童书店、中国文化服务社、独立出版社和胜利出版公司,成为“十一联”负责印行。

1942年,将中小学校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归并于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编写各科教科书,各科教科书由商务、中华、正中、世界、大东、开明、文通7家书局印刷发行,各校自行选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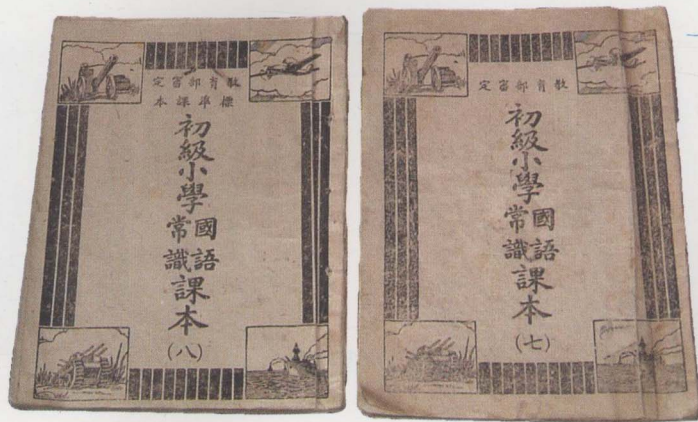
2. 革命根据地的教科书

早在苏区时期,革命根据地就禁止使用基督教的书籍、国民党文化书籍和四书五经等作教材,要求

各地小学使用苏区政府组织编写的教材。抗日战争爆发后,各出版机构内迁重庆,教科书由多家出版机构竞争出版的局面改为“国定本教科书”局

各地小学使用苏区政府组织编写的教材。共产党设立了中央和地方级教科书编审机构,专门出版供军人、干部、学生和农民使用的教科书,主要有政治类、军事类、文化识字类、扫盲类及专业技术类教科书。在延安时期,教科书管理机制趋于完备,教科书更为系统,并总结出教科书研制的经验。

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于1938年、1942年和1944年出版3套初级小学课本。为了密切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实际,联系生产劳动和边区群众生活实际,密切联系儿童的知识经验和生活实际,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边区等出版了多套教科书,其中有些教科书采取语文和常识混合编写的模式,既教语文,也教当时生产和生活实际所需要的科技和生产常识。由于条件限制,运输困难,当时的教科书都由各地自己翻印出版,所以同样的教科书有许多不同的版本。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条件的改善,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质量都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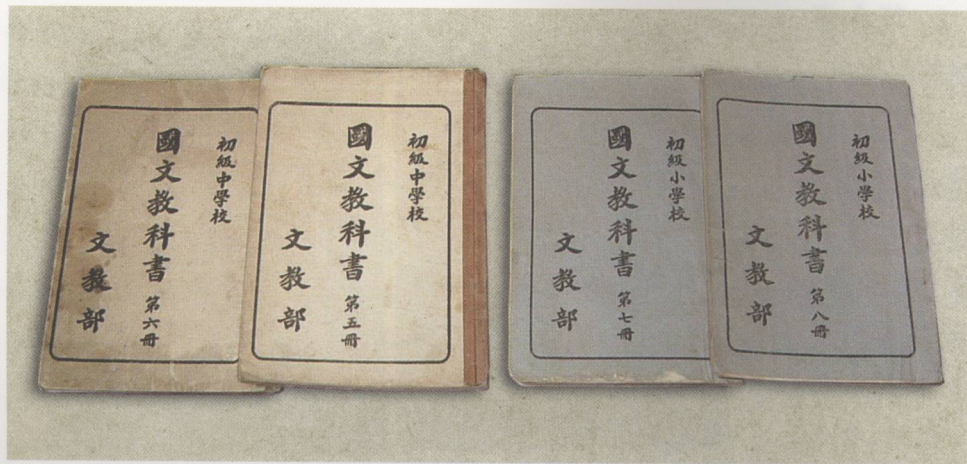
了较大的提升。

3. 日伪统治区的教科书

1937年12月和1938年3月,日本在沦陷区北平和南京两地,分别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贯彻落实其教育政策,汪伪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严格审定和控制教科书,出版统一的教科书,以符合日本侵华战争的需要。汪伪政府的教科书主要由教育总署编审会编写出版,由新民印书馆印

刷发行。

伪满洲国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建立的一个傀儡政权,通过这一傀儡政权,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了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伪满洲国建立了12000所小学、200所中学、140所师道学院,以及50所技术及专业学院和一些军官学校。在伪满洲国教育系统中,共有60万学生和25000名教师。另外,还有1600所私立学校(日本批准),150所宗教学校以及哈尔滨地区的25所俄国学校。



1932年,伪满洲国刚刚建立,羽翼未丰,即着手编写奴化教育课本。并规定:从1936年起,中小学教科书必须采用“国定教科书”“审定教科书”。1932年,奉天省教育厅图书编审委员会出版了一套《满洲国小学教科书》,有修身、国文等科目。1932年始,“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编辑出版了初级和高级新满洲教科书。1934年,伪满洲国政府文教部出版了《初级小学教科书》一套,有修身、国文、算术、自然等科目。1939年,伪满洲国政府民生部出版国民学校日语国民读本8卷,由满洲图书株式会社发行。

清末民国教科书的发展轨迹,也是中国社会的变迁和教育改革的发展路径,这是中国知识精英对大众进行启蒙总动员思路的引领下的艰难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也无法忽视动荡岁月里卓尔不群的广大知识分子,将自己对民族、对祖国的满腔热情熔铸在一本本小小的教科书中,为幽暗时空的中国社会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成就了百年教科书发展中辉煌的一段。教科书中一行行文字、一幅幅插图、一篇篇课文……使启蒙犹如静水深流,润物无声,不断浸润着中华大地,激荡着古老的神州……于是文明在潜移默化中前行,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

目录 CONTENTS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
BAINIAN ZHONGGUO JIAOKESHU TUSHUO



- 序---001
- 清末民国教科书发展概述---001
- 第壹章 自编新式教科书的开端---002
- 第贰章 现代教科书的成型---056
- 第叁章 官编教科书的强化---072
- 第肆章 蓬勃发展的教科书时期---094
- 第伍章 教科书迅速变化和模式化共同演进的时期---228
- 第陆章 伪满洲国和伪蒙古国教科书---342
- 第柒章 边区教科书的发展---364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